

主题书坊

书房里那些哲学丛书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曾经熙熙攘攘、热闹非凡的北京海淀图书城，是我大学时代流连最多的地方。当年这一带有像国林风、二西堂那样的大书店，还有几十家特色不一的小书店以及唱片店、文具店、服装店等。我隔几天就要来逛一遍，知道哪家书店上了什么新书，哪家唱片店来了什么新专辑。

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不自觉地成了一头存在主义“小白”，努力搜刮一切关于存在主义的书。也看了一些像克尔凯郭尔、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、萨特、波伏娃、梅洛·庞蒂、加缪、卡夫卡等存在主义大咖的作品。其实在我上大学那会儿，存在主义已经不太热了，除了存在主义著作，当时还有几套西方哲学丛书特别亮眼，每每看见就想拿下。

首先是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，这套书太有名了，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丛书之王。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等几个系列在书架上整齐码开，简直太好看、太舒服了，现在估计已经达到七八百个品种，已经完全分不清哪本是哪本，当年逛书店的时候，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系列都有多少个品种，一旦有新货立马就知道，然后站在那里翻读很久，因为这个系列品种太多，而且很好买，反而买得比较少，偶尔在旧书店看到打折才会拿下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，研究西方哲学最重

要的学术群体就是“文化：中国与世界”编委会，当时中国学界的中坚代学者几乎都在这个编委会里。三联书店、“当代西方学术文库”和“新知文库”两个系列都是这个编委会策划的。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收录了大量西方哲学经典级的作品，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，还有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，本雅明的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等等。每次看到这个系列的封面就很想买。

新知文库都是一些体量比较小的作品，比如加缪的《西西弗的神话》，还有一些哲学家的小传。这个系列倒是买了很多，主要因为价格比较低，在旧书摊经常五毛一块就能拿下。

再来介绍一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“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”，这套书被称之为“小黑书”，全黑的封面，正中间鲜艳的马赛克图案，这套书是我的最爱之一，有卡西尔的《人论》，波普的《猜想与反驳》，马尔库塞的《爱欲与文明》，雅斯贝尔斯的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等等，当时书店和书摊上这套书的数量并不是很多，所以但凡看见总要忍不住拿下。

再来介绍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“西方学术译丛”，这套书的设计也是一眼相中，白皮中间拦腰一段色块，书名印在色块的区域，像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，伏尔泰的《哲学通信》，胡克的《理性、社会神话与民主》，莫里斯的《开放的自我》等等。这也是少有的那种见一本收一本的书。

最后介绍一套华夏出版社的“二十世纪文库”，包含了政治学、哲学、法学、心理学等等，雅斯贝尔斯的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波普的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，马斯洛的《动机与人格》等等，都是这套书里边的经典。一开始我不太喜欢这套书的设计，大红大绿大蓝，再加上一个抽象的图形，后来时间久了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舒服，也是收了不少。

最近在整理书房，翻出一些当年费尽心思淘的旧书，20多年来，我一眼都没有再瞄过这些书，如今从书堆里翻出来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感动，小回味。



新作 述评

《停下别动，放大看》：高清图像是时代送给艺术史的礼物

人文科普作家吕震的新作《停下别动，放大看》有个副标题，“看画惊喜笔记”。书中的“画”，涉及西方120余件经典艺术之作，其中以油画为主线，雕塑、手稿等艺术形式则为辅线。而观看画作的方式，不再是传统的艺术史方式。

传统艺术史的看画方法，不外乎两种途径：一是画作本身的造型、艺术、风格、理念、主义；二是知人论世，了解画作背后的作者、时代、地域。吕震的看画方式，是将“绘画艺术”当作“历史图像”来看。

吕震是站在“历史图像”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品的。他认为，在这个时代，看一幅画的最好方式除了去现场看原作，就是在电脑前仔仔细细、一点一点地看高清图，这样才能把它的细节完全搞明白。一幅画一旦有了电脑里的高清大图，就像一件绝美华服连针脚都毫无保留、尽收眼底。观者对它的欣赏不是思考的结果，更像本性的爆发，就是想无限接近它，彻底搞明白，甚至据为己有。

无论一幅画的艺术造诣有多高，我们都无法只通过直接感受艺术品去了解当时的时代，必须将画作放大无数倍，仔细观看其中的细节，同时查阅资料了解画作被创作时的社会背景，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绘画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感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以笔记的方式去看艺术作品。这有点儿像上课时做的课堂笔记。笔记中，有一部分是老师教给我们的新知识，另一部分是颠覆我们本身认知的知识，后者在我们日后的进一步学习中有着重要意义。

在书中，作者采用了“笔记”的体例来看高清图像后的历史细节。以伦勃朗的名作《夜巡》为例，如果我们只关注这幅画本

身，得到的更多是直观感受：它叫《夜巡》，那我们自然会认为画中的场景是发生在某个夜晚。这其实与伦勃朗的创作初衷完全不同。伦勃朗于1642年完成了这幅作品，原名叫做《弗兰斯·班宁克·上尉和威廉·凡·路伊森伯奇中尉的连队正在准备出发》。过了两百多年，到了19世纪，这幅画在时间的洗礼中已经改变了“形象”：画面上的颜料氧化，且堆积了很多污垢，使得画面看上去很黑，画中的一些人物几乎无法识别。于是有评论家将这幅画命名为流传至今的名字——《夜巡》，即夜间巡逻的意思。但是，1947年人们对这幅画进行了清洗、修复，发现画面中人物的动作更像是发生在白天，《夜巡》这幅画实际上画的不是夜晚。

除此之外，书中还看到以下问题并做了解读：蒙娜丽莎的眉毛去哪儿了？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戴的耳环并不是珍珠做的？《雅典学院》里的人能和古希腊时期的真实人物一一对应吗？王室婚礼大场面宁愿用两年等一幅画也不愿用现场照片？……

藉由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理解，在观赏一幅画的时候，除了在感性上被震撼，还应该理性的思考来自作品内的信息和观看者的学识，我们能感受到的信息直接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积累，于是在看画时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差异，而这种差异性也恰恰是所谓的观看壁垒。在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后，作品中传递的信息也就更容易被我们捕捉。

“感谢数字时代能让我们真的把它们据为己有，一点一点品味它们的美好。高清图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送给艺术史这个领域最好的礼物之一。”吕震在书中说。

吕震将视觉艺术当“历史图像”观看的角度，符合了艺术史学界“图史转向”的趋势。长期从事图像学研究的李公明教授认为，“历史图像学”以历史上的图像史料为基本研究对象，坚持在历史语境中解读图像，同时充分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历史图像，目标是建立带有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叙事模式，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；历史图像学的主干应该建立在以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思想史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及研究成果。在吕震的《停下别动，放大看》一书中，呈现了“历史图像学”的重要作用及独特魅力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/ 图



新作 推介

《粮食、运河与白银》：

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

回望历史，就如转动一个万花筒，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实在不同的角度下，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。即便是对同一个历史事实或话题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，这恰是历史的迷人之处。《粮食、运河与白银》一书有个副标题：“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”，揭示了该书的主旨，即从粮食、运河、白银等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，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和经济之间有趣的互动。

民以食为天。该书认为，“粮食”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发挥着“国之根本”的作用。中国古代表关于“国之根本”的论述通常有二：一是《左传》所说的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祭祀祖先神明与兵事守土开疆，无疑是一个国家的两件大事，前者形成了国民的集体共识和相似的价值底色，后者给域内国民提供安全感；二是儒家圣贤以“礼乐”作为国家根本，礼崩乐坏之日便是国家行将消亡之时。但《粮食、运河与白银》一书认为，与军事、祭祀、礼乐相比，粮食是更为底层、更为本质的国之大事，没有粮食的保障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读懂了中国大地上的粮食，方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。

作者从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演进为出发点，谈及粟类、麦类、稻类交替成为中国农耕大地上“主角”的背后故事。要言之，当一种主流的粮食作物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时，便有新的粮食品种登上历史舞台。随着“大航海时代”美洲新大陆的发现，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、地瓜、土豆、花生、向日葵、辣椒等于明朝年间陆续传入中国。适应性极强、产量极高的玉米、土豆、地瓜等品种在中国大规模种植后，中国的人口顿时起飞，明末清初时已达1.5亿，在清朝“康乾盛世”时达到3亿。相反，如果人口减少和饥民遍地，也会让强盛的王朝陷入动荡之中。

人的生存需要交换。作者认为，中国古代的钱主要是指铜钱和白银，黄金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具有货币功能。古代经济的发展受到这些金属货币供应量的强烈影响。当经济总量增加的时候，王朝管理者渴望有与之相匹配的货币供应量，要么想办法提高金属货币的供应量，要么采用其他一些有价证券，比如纸币或者盐来作为货币等价物。金属货币的短缺会带来通货紧缩，这曾经令许多王朝痛苦不堪，有的王朝不惜

铤而走险，用劣质货币或泛滥的纸币来渡过危机，最终不过是饮鸩止渴。

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货物的流通离不开路：陆路、空路、水路。在古代中国，“遇山开道、遇水搭桥”的陆路建设成本太高；空路没有技术支持；水路成了最廉价的交通方式。其中，水路包括漕运和海运。

漕运中，在隋朝横空出世的京杭大运河，彻底改变了此后千年中国历史的走向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，大江大河整体的流向是东流如海。我国在广阔的疆域中，缺少沟通南北的水系，南北之间交通不便，也在动乱的年代形成南北分治的状况。历史上先后人工开凿过数条沟通南北水系的运河，沟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可算人间奇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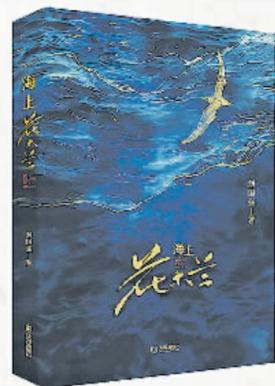
海运的发展直接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。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，从东北蜿蜒转向西南，漫长的海岸线加上可以从海洋驾驶入的一些大河，比如长江、黄河、钱塘江、珠江、闽江等河，是中国文明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。早在公元前，古代中国的邻海就有海外贸易的历史记载。



在造船技术、导航技术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借助季风和洋流等自然条件，利用传统的航海技术横跨大洋，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路网络，形成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海洋文明。

总之，该书对影响历史进程的粮食问题、土地问题、食盐问题、货币问题、交通问题、贸易问题、技术问题等都作了充分的阐述，为读者利用经济规律分析历史和现实，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启发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/ 图



变、生产方式在变，但海洋岛“三八女炮班”吃苦耐劳、苦练深功的敬业精神从未改变，她们舍小家为大家、以保卫国家海防为己任的奉献精神也从未改变。

李朝全

《海上花木兰》：

塑造守岛卫疆的巾帼英雄群像

刘国强长篇报告文学《海上花木兰》，将笔触伸向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海洋岛镇民兵组织“三八女炮班”，讲述了60多年来14代女民兵刻苦练兵、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。

“三八女炮班”的家乡地处黄海前哨，位置险要，近卫大连、远护京津冀，历来是战略要地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军民共同协防、为祖国守岛卫疆的任务迫在眉睫。上世纪60年代，因岛上的男人们长年出海远航，女人们义无反顾地冲在护边前线，成立了“三八女炮班”，她们一手织渔网，一手拿钢枪，苦练本领，保卫祖国海防。

写好“三八女炮班”的故

事，难在从跨越数十年的大量材料中拎出主线，写出鲜活的现场感，避免平铺直叙。作者先是走乡串户，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，深入海防和军营采访100多人，获取第一手鲜活资料，进而充满感情地进入角色，投入真情去创作。在谋篇布局上，作者跳出惯常叙事，尝试创新结构和手法。作品每章用长海县的“土特产”与“船工号子”开头，体现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色彩，文字表达上也以抒情风格见长，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情，读来津津有味。

作品从个人成长出发，展现来自各行各业的队员如何拧成一股绳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

民兵集体。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，叙述女民兵们参差不齐的身体素质和基础条件，而后笔锋一转，描写她们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的优异成绩。写第一代女炮班成员，先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切入：除了班长张淑英，有4位是文盲，这些有家有娃的母亲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，晚上训练、学文化。作品擅长抓细节、描绘细节，写她们的训练、生活和比武情况，用参加全军和全国民兵比武取得的好成绩，凸显女炮班不怕苦不怕累、勇于拼搏的精神。

在对一代代女炮班事迹的讲述中，作品抓住了她们不变的精神品质。时代在变、观念在

书市 随想

“建本图书”到底如何，不妨让子弹飞一会

读书人梁文道及其参与创建的“建本文库”，在今年“世界读书日”上成了现象话题。这一天，他的“纸书末日”观以及一年十部书一万元的会员年费，搅乱了书市的一池春水。

书市上的绝大部分图书可称为“标品”图书——在编辑出版、印刷发行各环节高度市场化、透明化的背景下，能规格化、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图书。一般的图书都属于“标品”，在没有名社名家、作者签名等等光环赋能的前提下，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便宜的同类图书。与之相对应的是“非标品”图书，不以大规模生产为目的，通过数量、质量、版本等方面的稀缺性，赋予图书较为高昂的价格。传统意义上，手工艺品、艺术品等也属于“非标品”行业。目前在书市上涌现的高端“收藏品”以及“定制书”，就是“非标品”图书。

高价值的“建本文库”，无疑走的是“非标品”的图书模式。用梁文道自己的话说，“建本文库”会不计成本，从版本选择、编辑校对、排版设计到印刷，每一方面都做到最好，把书做成“一本书该有的样子”。他希望读者把这套“建本文库”看成是人生中重要的投资，意识到买书这件事不是吃个快餐那么“简单”，去爱

惜做得好的纸书，为此感觉“值得”。

“建本文库”选择走“非标品”模式，与梁文道的“纸书末日”观相关。在“世界读书日”这天，梁文道发出了“纸书很快就要迎来它的末日了”的言论，对纸质书的未来充满了忧心。这一论调虽是老生常谈，但在“世界读书日”这天拿出来郑重讨论，显然更具话题性。当天出炉的2023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，以手机和Pad为载体的数字化阅读比例较上一年有所增长，越来越多的国民喜欢听书和视频讲书。数字化的“快餐”阅读大行其道，纸书末日似乎成为一个预言。

但大部分网友对梁文道及其“建本文库”表示质疑。究其原因，一是认为“建本文库”提供的稀缺性，不足以支撑其高昂的价格。理由是“建本文库”当天发布的第一部书为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该书虽然由翻译名家李继宏翻译，装帧名家陆智昌设计，但版本没有稀缺性。而且剩下的9部书处于保密状态，有意愿入会的读者并不知道未来会拿到什么书；二是高额的费用实际上将有心追随却无力付费的读者推远了；三是信息时代资讯泛滥，海量的免费图书且应接不暇，更不必再为高昂的图书付费。

梁文道由此陷入漩涡之中。而作为一名爱书人，我很难去质疑梁文道。第一次见他，还是在读大学时，学校邀他作“人文讲座”。其在凤凰卫视的“开卷八分钟”视频，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。当时很喜欢他讲述的方式，尤其是节目结束时，一身西装、一双皮鞋的梁文道，合上书便走的场景。有种“当止则止”的意味。

那时“凤凰卫视”的节目都很受欢迎。除了梁文道外，英文涛的“锵锵”、胡一虎的“一席谈”、鲁豫的“有约”，无不是互联网上的热门标签。

至今仍记得梁文道在讲座上的开场白，他的大意是：“古代东方和西方的教育，都是从树下开始的。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道在在林间，孔子有杏坛……所以我相信，树下的学校一定会有好的教育。”

作家唐诺有个观点，寻找好书有点像“狩猎”，带有强烈的不确定因素，待到猎物而时时竟有饥饿感，是狩猎文明的特征。但寻找好书其实是有捷径的，即去读所喜欢的作者的书远比通过铺天盖地的“书单”去找书高效得多。

后来，互联网进入“APP时代”，APP是封闭的系统，像是一个个围起来的“孤岛”，推送算法则是围住“孤岛”的护城河，



也是蓄养用户的蓄水池，或者说“茧房”。风生水起的是短视频、网文、短剧等内容，而不是严肃的深度阅读。

梁文道称当下是“纸书末日”，还有另一重理解：“纸书”所象征的宽阔和深层，有日渐走向狭窄和浅层的倾向。他对阅读的现状是怀有忧患的。对于一个充满忧患的读书人，很难怀着恶意去作揣测。

“建本图书”到底如何，不妨让子弹飞一会。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/ 图